

新世纪中西方文艺理论构建概述*

薛 原

【提 要】伊格尔顿的经典著作《理论之后》重新唤起了中西方文论界讨论和构建理论的危机意识与热情，是文论界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本文辨析了中西方学界对后现代“文化理论”以及“理论已死”等著名论断的不同接受程度，并由此出发梳理了后理论时代中西文论发展的主要线索，从而引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时间节点和发展路径。本文视 21 世纪为我国文论构建的新起点，并着重论述、探讨新世纪的中国文论如何构建这个话题。在新世纪，我国文艺理论学界的主要研究领域，如中国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通过对西方文论的批评、解读、扬弃、融合，逐步走向了自我重构。

【关键词】中西文论对比 “后现代之后”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6) 06-0081-09

为了应对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中西方文艺理论在 21 世纪伊始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了百废待兴、亟待重组的关键时期。本文之所以将新世纪中西文论构建的起点都设定为后现代文化理论的衰落时段，是因为“后现代”思想不仅在西方文化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中西方对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的不同反馈是由于中西学界对后现代文化和理论有不同程度的接受、理解和反思。在诸多西方学者宣称后现代文化理论衰落之后，中西方文艺理论将何去何从，如何重新整合现有的理论资源从而走向文艺理论的“复兴”，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一、“理论之后”在西方学界

伊格尔顿在其著作《理论之后》中所说的“文化理论”主要指发源于 1960 年代，在“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哲学

和文艺理论。在“文化理论”崛起的这一时期，“后现代”几乎统治了西方绝大多数的人文科学和价值观念。^①

伊格尔顿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包含了两层含义：

首先，哲学的“轴心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声称包罗万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理论早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正是所谓的“文艺理论”（即“文化理论”）。其次，曾使得社会文化得以解放，并推动“文化理论”走向兴盛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社会弊端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1 世纪中西文论关系研究”（16BZW012）的阶段成果。

① “文化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人文科学研究不再是精英的专利：其研究的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逐渐与社会现实、普罗大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 2009 年版，第 29 页。

渐显露。^①后现代背景下的“文化理论”到了1990年代末已如强弩之末。无论是曾经带来很大社会影响力的“身份理论”还是“后殖民理论”都因丧失社会关怀而逐渐与现实脱节并走向衰落。因此在“后理论时代”，无论是哲学本身，还是建立在对形而上哲学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的后现代“文艺理论”将何去何从，成为学界难以回避的话题。

美国学者卡勒界定这个时代“理论”书写范围时认为，“文艺理论”涉及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别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和社会学等广泛的学科门类。他进一步归纳出当今“理论”书写的四种特征：第一，理论是跨学科的话语；第二，理论是分析和沉思的；第三，理论是一种对常识的批评；第四，理论是反思性的带有质询性的思维。^②因此，只要有思辨、批评和质询并兼具跨学科的特征，就可以被称为“理论”。以此标准衡量当今西方理论研究，众多“理论”发展脉络极其庞杂、多元和分散，本文只列举几个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发展潮流。

第一是“理论”持续性的跨界发展。后殖民主义、女权研究和生态批评等重要西方“文化理论”并没有“死去”，其发展趋向多元化、跨文化化和跨学科化。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相结合，赋予这项研究新的生命力。伴随着西方世界“同性恋平权运动”的蓬勃兴盛，后现代“女权主义研究”逐渐让位给涵盖人群更为广泛的“性别研究”。全球环境问题的加剧则使得生态批评热度不减，不断推陈出新。^③后结构主义的定式和方法虽不再受学界推崇，但由此衍生出的“性别理论”发展势头惊人。后结构主义的生命力主要是通过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来实现自我更新的。相对于哈贝马斯的对话式“言论”，福柯的后现代“言论”概念更加广为学界所接受，成为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言论分析”的理论基础，也多被运用到文学文本的分析中。西方叙事学研究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发展到后经典叙事学，并逐步实现与伦理学的交叉并轨。

第二是“回归”传统的发展倾向。后理论时代，美学在后现代“反美学”思潮后又回归到西方文艺研究领域并重获学界青睐。但由于传统美学适用范围的局限性，“美学转向”动力不足。所谓“伦理转向”又因其无限吹抬犹太人的“悲悼叙事”而颇受争议。于是，很多文艺理论家将形而上和辩证哲学重新纳入自己构建文艺理论的源泉，试图通过复兴哲学而激活文艺理论研究。^④不仅如此，对现代主义经典的研究的兴趣在“后现代之后”也逐渐回归，现代主义代表性理论家华尔特·本雅明、阿比·瓦尔堡、格奥尔格·齐美尔、埃里希·奥尔巴赫、汉娜·阿伦特，近期在人文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上出现的频率并不低于以福柯、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家。^⑤

第三种发展方向为“后现代之后”文化和文艺理论。这是本文将要梳理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21世纪初，西方学界开始提出“后后现代”（post-postmodernism）这个概念，以探讨“后现代”以后的文化的新发展。自此，文论家们分别从社会学、文化学、媒体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角度，阐明了“后现代”已渐行渐远，“后后现代”社会已经到来的观点。

二、“后现代之后”在西方学界

俄罗斯语言文学学者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在真理、身份、客观与主观、乌托邦与现实等传统现代主义的名词之前冠以

① 《理论之后》，第16~28页。

② Joh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 pp. 14-15. 转引自王一川：《“理论之后”的中国文艺理论》，《学术月刊》第11期。

③ 王宁在他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以广阔的文化研究视角对“文化理论”在“后理论时代”的发展进行了详细梳理。参见王宁：《“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④ 程朝翔：《理论之后，哲学登场——西方文学理论发展新趋势》，《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文中提到了文学理论的哲学化倾向。

⑤ 西格丽德·威格尔：《文学、文学批评及文本可读性的历史指数》，《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

前缀“超”(Trans)。在他看来,“后后现代”文化是脱离了无休止的、剥离了意义和目的的后现代式的反讽(irony)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美国文化和人类学家埃里克·甘斯(Eric Gans)认为“受害者”和“作恶者”的后现代伦理设定导致社会各阶层的对立。他所谓后千禧年主义(Post-millennialism)文化则抛弃了这种“受害者伦理”而提倡一种“无受害者”的平等对话。^①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莫拉鲁(Christian Moraru)的泛现代主义(cosmodernism)认为“后现代”的结束和后后现代社会的开始以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结束为节点。这标志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后现代”的怀疑主义所带来的社会意识的分裂和对抗之后,逐步成为一个趋于和谐的意识整体。莫拉鲁在其著作《泛现代主义,美国叙事、后全球化和新文化想象》^②中将泛现代主义的上述特征归纳为“关联性”(relationality),以区别于“后现代”的差异性和分裂性。德国学者克里斯托夫·里德维格(Christoph Riedweg)编纂的论文集《后现代以后,关于文化、哲学和社会的最新讨论》^③中提出“后后现代”出现时间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和金融危机以后。西方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出现的危机意识集中体现为一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和反思。里德维格和论文集集中其他一些欧洲思想家认为在偏离了后现代式的言论和语言构建主义(konstruktionismus)之后,在文化、政治、社会 and 哲学领域又出现了摒弃后现代式的理想主义、“回归现实”或称“新现实主义”的倾向。英国学者阿兰·柯比(Alan Kirby)的数字现代主义(digimodernism)将高科技数字化革命视为导致“后后现代”社会(也就是当今社会)快速、简单、肤浅和空虚的罪魁祸首。^④他认为在“后后现代”媒体社会,传媒接受者进一步改变传媒发出者的统治地位,拥有改变文本的能力,甚至完全成为文本。

通过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看出,无论是冷战结束、“9·11”事件后反恐战争爆发,还是金融危机和社交媒体的大行其道,都导致当时塑造后现代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一去不复返了。来自西方不同文化圈(主要是美国和欧洲文化

圈)的学者们开始从不同层面剖析和描述这个时代的文化与社会走向,并反思后现代框架下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给西方社会带来的困境。如果对以上几种“后后现代”思想作一个分析总结,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些共同点:这些概念都批驳了一些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流弊;这些学者都认为,以反讽、怀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已经过去了;言论构建已不再是人文科学领域研究的关键词,“现实”以新的方式回归;在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各学界则出现了理性、中心和主体等概念回归的倾向。在这些著作中,文学常常作为一种文化经验被探讨,其独立意义则被忽略。

以上诸多观点虽然对了解“后后现代”文艺理论产生的背景和社会环境有指导作用,但不能直接将其嫁接到文艺理论体系中去。一种文艺经验消亡,它所支持的文艺理论便也随之枯萎;一种文艺经验旺盛,它所支持的文艺理论也相应活跃,或被新的理论所吸收。新时代的文学呼唤新的文艺理论体系。“后后现代”的文艺理论家们纷纷宣布典型的后现代文学正在逐渐消亡。^⑤玛丽·霍兰(Mary Holland)在《延续后现代主义:美国当代文学中的语言和人道主义》^⑥中将21世纪的新小说视为一种人文主

① Eric Gans, *Victimary Thinking Forever? Anthropoetics*,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ol. 230, 2001 (<http://www.anthropoetics.ucla.edu/views/vw230.htm>).

② Christian Moraru, *Cosmodernism: American Narrative, Lat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Cultural Imaginary*,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1.

③ Christoph Riedweg, *Nach der Postmoderne: Aktuelle Debatten zu Kunst, Philosophie und Gesellschaft*, Basel: Schwabe, 2014.

④ Alan Kirby, *Digimodernism: How New Technologies Disrupt the Postmodern and Reconfigure Our Culture*, London: Continuum, 2009.

⑤ 罗伯特·麦克劳克林认为在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中出现了大规模的美学转向。Robert McLaughlin, *Post-Postmodern Discontent*, in R. M. Berry, Jeffrey R. Di Leo eds., *Fiction's Present: Situating Contemporary Narrative Innovation*, 2007, p. 103.

⑥ Mary K. Holland, *Succeeding Postmodernism: Language and Human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是对后现代反人文主义(antihumanistic)的反叛。^① 霍兰在尼克莱恩·蒂默(Nicoline Timmer)的《你也感觉到了吗?世纪之交的后现代美国文学症候》^②中描述了当代美国文学中使主体(自我)“重新人性化”(rehumanization)^③的策略以对抗后现代式的去主体化策略。在这一主题下,作者列举了“后现代”文学中19个与后现代文学相左的特征,其中包括“后现代”文学中的主体和框架构建等。瑞士伯尔尼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学者伊尔姆陶德·胡伯(Irmtraud Huber)在专著《后现代以后文学,重塑的幻想》^④中将反叛和颠覆视为后现代文学的第一宗罪,她将“后现代”定义为缺乏乌托邦的时代。她把“后现代”的新文学里的叙事策略定义为重新定向和美学重构。在经历了后现代文学以后,新文学并没有退回到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而是在现实中构建出一个美的乌托邦。沃尔夫冈·芬克(Wolfgang Funk)主张以“文学重建”来填补自后现代解构主义衰落以来在文化和文学史上出现的空白。芬克从哲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与“直接经验”相关的“真实性”将如何颠覆后现代主义。^⑤

《元现代主义札记》^⑥一文正式宣告了“后现代”(或如该文提出的“元现代”)这一概念在中国人文学界登陆。文章认为在元现代的实践中“最杰出的代表当属艾什曼(Raoul Eshelman)教授的表演主义”。比较文学研究者艾什曼认为自1990年代末开始,曾经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霸一时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所倡导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正逐渐为相对的封闭性和单一性所取代。艾什曼在其独创的“表演主义”理论中融合了“后现代之后”的新哲学思想和康德美学以诠释“后现代之后”文艺作品中的伦理转向。^⑦

综上所述,“后现代之后”西方理论专著中主要出现了以下两种理论构建思路。首先,一些理论家们进一步消解了文艺理论和文化理论的界限,他们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领域观察和描述“后现代之后”的文化走向,并援引文学和艺术领域中的例子

来佐证他们对时代的诊断和预测。其次,另一部分理论家或以开放的眼光汲取其他学科的成果来构建和丰富自己的文艺理论,或从美学、伦理学或哲学等领域中另辟蹊径,寻找到诠释文艺作品的新角度。这些文学批评理论来源于具体的文本分析,又不局限于文本分析,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但这些作者往往囿于自身所处文化圈,过于强调某一个文艺现象的重要性,缺乏全局视野,结论有时未免有失偏颇。这些“后现代之后”的文艺理论著作虽还未成体系,但已经为文艺理论的复兴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和新的思路。

三、“理论之后”在中国学界

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发表后立即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不小的波澜。学者对“后理论时代”文艺理论的发展走向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今天。我国学者对后现代“文化理论衰落”的这一说法之所以大为认同,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全球化和信息数字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文化呈现出“去中心化”和“多元化”两种类似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倾向。这两种倾向都迫使中国学界对现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反思,并引发了

① Mary K. Holland, *Succeeding Postmodernism: Language and Human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p. 1.

② Nicoline Timmer, *Do You Feel It Too? The Post-Postmodern Syndrome in American Fiction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Amsterdam: Rodopi, 2010.

③ Nicoline Timmer, *Do You Feel It Too? The Post-Postmodern Syndrome in American Fiction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p. 23.

④ I. Huber, *Literature after Postmodernism, Reconstructive Fantas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⑤ Wolfgang Funk, *The Literature of Reconstruction: Authentic Fic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⑥ [荷] T. 佛牟伦、R. 埃克:《元现代主义札记》,陈后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11期。原文载于瑞典期刊《美学与文化》(Journal of Aesthetics & Culture) 2010年第2期。

⑦ Raoul Eshelman, *Performatism, or The End of Postmodernism*, Aurora and Colorado: The Davies Group Publishers, 2008.

学界构建新理论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其一是“去中心化”倾向。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使得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媒体代表的精英文化与网络媒体代表的大众文化短兵相接，精英文化逐渐在很多领域屈从、甚至让位于大众文化。依托互联网传播的文学大大缩短了文学创作、传播的时间。众多网络写手一夜成名，网络点击率高的文学作品直接被拍成影视剧。其形式也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平台，影视和社交媒体等新的传媒方向转换和发展。文学的大众化、市场化和商业化趋势不可避免。学者们试图在精英和大众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界定文学和文学理论日趋模糊的边界。基于文学形式和传播方法的改变，主要以“纯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的存在意义也受到质疑。

其二是多元文化观的普及。大约于1980年代末进入我国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学术界的观念和生态。很多学者倡导多元文化观并使其在中国广为人知。他们对“欧洲中心主义”、“美国霸权主义”和其他中心主义持批判态度。凭借“后现代”框架内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学者们掌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除此之外，“后现代”框架内的女权主义和生态批评等理论也大大丰富了我国文艺理论学者的文化视野，为中国社会注入了多元的价值观念。虽然“理论已死”所带来的怀疑和悲观情绪多少影响了中国学者，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也意识到，西方文化理论的衰落为中国理论在世界学界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

李泽厚所理解的“理论已死”是对西方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的总结和预测：西方形而上哲学一步步被解构走向穷途末路，西方形而上的理性、辩证和逻辑传统后继无人。因此，他认为，在形而上哲学和西方文艺理论式微的今天，该“中国哲学登场”了。^①李泽厚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可以继承后现代文艺理论注重现实的优秀传统，也有可能唤起新时代哲学研究的热情。

而就“理论之后”中国学者应该如何构建新文艺理论这个话题，我国学者主要持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跨学科性特点越来越突出。文学研究是否应该让位于文化研究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王岳川认为文学理论逐渐成为一种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媒学于一身的泛文化研究理论。^②王宁也认为在“后理论时代”理论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侧重形式的文学理论衰落了，文学理论已经向文化理论转向。^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理论应该来源于文学并服务于文学。王一川认为在西方正统文艺理论衰落的今天，中国文艺理论的构建应走向虽不起眼但务实的“小理论”。文艺理论本身来自文艺阅读，一些强有力的文艺理论反思，往往来自文艺作品本身。^④张江所提出的“强制阐释”相关理论认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大弊病在于，文艺理论家将哲学、其他人文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引入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从而使得文学理论丧失其对文学本身的针对性和解读能力。^⑤究竟是将文学研究升级为文化研究，还是将文学研究还原到对文学本身的研究，成为当今我国理论学界争议的重要问题。

如前所述，21世纪以来，中西方文论都不约而同地陷入文艺理论构建的困境之中，都面临危机且亟需重建，也因此具备了加深对话的基础。新世纪以来，西方盛极一时的后现代思潮逐渐受到冷落，各种新思潮虽如雨后春笋般萌发，但却难成体系和气候。有鉴于此，中国学界的精英们以前所未有的信心着力于文艺理论的新构建。

四、新世纪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构建

无论是全球化进程，还是中国的崛起都为

① 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② 王岳川：《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2期。

③ 王宁：《“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

④ 王一川：《“理论之后”的中国文艺理论》，《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

⑤ 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21世纪我国文艺理论真正走向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我国文论界自21世纪以来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状态。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相互借鉴融合,形成了“古今对话”和“中西对话”的开放式交流格局。文艺理论各个研究领域渐成体系,聚集了一批有鲜明观点的代表人物。进入新世纪,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各个流派的研究各有消长:阐释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对中国学者仍具吸引力;接受美学逐渐与我国古代文论融汇贯通;以聂珍钊等为代表人物的我国伦理学研究基本与西方同步;以申丹等为代表的我国叙事学研究跨越到后经典叙事学研究阶段;以曾繁仁和鲁枢元等为代表的生态批评从“小生态”进入到“大生态”研究;随着文化民族主义的降温,中国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热度渐失。综上所述,21世纪中西文论交流较1990年代更密集、更开放、更多元也更具体系,有其鲜明的特征。在短短15年时间内,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通过对西方文论的解构、重构和整合来探寻建构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最有效途径。中西文学研究的对话模式正逐步发展,并渐渐突破了传统的、单向交流的范式,向着更成熟、更深入的双向交流方向发展。

我国21世纪的文艺理论建构主要分三种模式。首先是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批评、解构和反思,主要包含针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而引发的一系列论战。其次是中国文论界与西方文论界的相互理解和对话。这些对话以借鉴和学习为目的,积极推动中西文论界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再次是中国文论的自我建构。这主要是指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对话,以及中国当代文论建构对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借鉴和融合。

(一) 中国文论界针对西方文艺理论的质疑和解构

第一是探讨在多元信息化社会背景下,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危机和出路。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分别在2002年和2004年发起了如何界定文学和文艺理论研究边界的讨论。2006年,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以“大众媒介技术和消费主义

挑战下的文学和文学生产”为题召开了第八届年会。面对新世纪社会文化的变迁,我国文艺理论学者表现出应对现实、革新思维的勇气。他们积极适应新状况,寻找对策,调整话语体系,参与国内外与此论题有关的研讨。这类学术讨论很“接地气”,也能带来积极的社会效应,甚至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成为文化思想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给后人以启示。

第二是就某一话题直接与西方学术界进行讨论和交锋。2014年张江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析——兼及中国文论重建》和《强制阐释论》两篇论文提出“强制阐释”相关理论。^①这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并成为当下颇具理论和学术价值的热点议题,在国外人文学者中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张江近年来与美国理论家米勒的对话也即将刊登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上。^②中国学者主动与国外著名学者就某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建立联系、展开讨论,甚至发起论战。而这也有利于未来中国学者进入国际主流学术圈。

以上两种形式都能积极促进新世纪我国文艺理论的构建。就一个社会来说,“热点议题”和大讨论的背后有观念的冲突、文化的变迁。就一名学者来说,一个新的视角需要学术积淀、思想的锐度和对外部世界的敏感关注。这些涵盖丰富的思想交锋可以带来新一轮的反思和质询,从而推动某一论题向更深和更广处发展,进而为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撑。

(二) 中国与西方文论界的对话与合作

中西交流是我国文艺理论构建的重要途径。但遗憾的是,过去的中西学术交流往往是平等互动少,从西方到东方这一单向传播交流方式占主导。张江认为我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汉学”的圈子里,而应该与一流学者建立学术交流。迄今为止,我国当

① 张江:《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析——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② J·希利斯·米勒:《“解构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致张江》,《文艺研究》2015年第7期。

代的文论还很少被西方一流学者所关注：欧洲科学院院士德汉坦称自己仅仅读过比较文学和文论学者乐黛云、孟华、王宁和张隆溪等的著作。^①当然，相比较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接受和研究，西方学者对中国文论的研究以及对中国理论学界的关注还比较欠缺。我国文艺理论学术精英已能够进入西方学术话语圈，虽然他们的学术成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认可，但仍需在接受西方文论基础之上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创的理论体系，有意识地融入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成果。王宁高度肯定李泽厚的论文《美学四讲》^②被收入《诺顿理论批评文选》（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第2版）的历史意义，认为这标志着西方文论学界首次“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从而实现了英语文学理论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认可和接纳”。^③王宁近年来致力于推进“世界文学”的研究，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带入这一研究领域，拓展了这项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些事件说明我国文论研究正在逐渐为世界所关注，学者们也逐渐树立起开创理论体系的学术自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上述事件将不仅仅是学术交流中的个案。

“中西对话”的重要性已经被中国文艺理论学界所认可。但对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发生冲突时，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这一问题，学者们仍持有不同立场。王宁认为令中国文论有效地走向世界的途径是“中外合作、以我为主”。文学理论应该最大可能地汲取国际学界的成果，这是一个艰难且需要胸怀的漫长过程，真正同一理论层次和水准上对话，才有学术的创造性发生。^④王岳川则提出“中西互体互用说”，即“平视对话和差异互动模式”，求平和、求生态、求多元是其基本特征。具体表现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方式。^⑤曹顺庆认为“盘活古代文论，要中国文论中国化，寻找我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支撑；吸收西方文论，是要西方文论中国化，化人若己，发我口出我心为我所用”。^⑥王一川提出时间会不停地把外来他者涵濡成自我；同时也会把自我涵濡为他者。自我和他者

在文化的涵濡过程中相互作用、不可分离。^⑦

上述这些学者都试图探寻中国与西方文化在文论构建中有怎样的相互关系。他们虽各有侧重，但都将“中西对话”和“中西合作”视为构建新世纪我国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则。他们都在探讨我国学者应该秉承怎样的原则、遵循怎样的方法，才能最大程度利用西方文论的优秀成果完成自我构建。

（三）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构建的两种具体途径

第一，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批判、借鉴和融合是建构有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主要途径。首先，新世纪以来文论家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验，将它看作构建中国化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资源，对接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其次，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研究涵盖广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批判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果以完善自身的理论构建，是新世纪我国理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再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可借鉴西方文艺理论的精华。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论马克思主义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方向。学者们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凭借的唯物、辩证、历史和宏观的思维方式对一些具体的文艺观念和美学思想进行整合，把它们放置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

① 张江、西奥·德汉：《开创中西人文交流和对话的新时代》，《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

② Li Zehou, 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 Toward a global view, in Vincent Leitch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York: Norton, 2010.

③ 王宁：《再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国际化战略及路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④ 王宁：《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⑤ 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西“互体互用”》，《文艺研究》2004年第2期。

⑥ 曹顺庆、王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当代文论的对话》，《当代文坛》2010年第3期。

⑦ 王一川：《层累涵濡的现代性——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发生与演变》，《文艺争鸣》2013年第7期。

坐标上,从而建构和谐有序的新的思想系统。这些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借鉴和融合了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著作。钱中文、杜书瀛、王元骧、童庆炳、陈传才、陶东风、陆贵山、朱立元、冯宪光、姚文放等学者都在融合西方文艺理论流派的优长、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的理论来源上做出了有益尝试。

第二种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具体途径是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相互借鉴和融合。曹顺庆认为复兴我国古代文论,并完成新文论的构建,“必须在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同时,而又吸收作为全人类文化成就的新型话语系统”。^①从新世纪开始,学者们将“古今对话”、“中西对话”视为重建中国文论的基础、原则和具体方法。^②新时期文学理论体系构建又因构建基础不同可分为“西式融合”、“中式融合”、“中西融合”以及文化语境下的文论体系构建四种路径,代表人物有蔡钟翔、陈良运、刘若愚、李春青等。

首先,中国古代文论与接受美学的结合成为中西文论结合之典范。接受美学和我国古典美学有诸多契合之处。比如,龙协涛的《文学阅读学》的核心观点是,“文学解读是以心接心,即读者用心灵观照作家观照过的社会与人生”,“两个‘心’的碰撞、组合、交融更是变幻奇妙,气象万千”。^③作者因此提出富含中国文学经验的文学阅读学概念。可见,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都不把文学研究视为对作品的静态的、对象化研究,而是把作品—读者作为整体进行动态考察。而接受美学认为作品与读者的互动所产生的视野融合是不断连续发生的,形成作者—作品—读者再到作者—作品—读者的循环。^④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的文学解读方法论建立在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文论联姻的基础之上:谭学纯和朱玲的《修辞研究:走出技巧论》、廖信斐的《文学欣赏探踪》和刘月新的《解释学视野中的文学活动研究》等。

其次,接受史研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最新突破口:尚永亮的《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和高日晖、洪雁的《〈水浒传〉接受史》都是这

个领域的代表作。这些中国古代文论的新研究领域都与西方接受美学密不可分。再次,我国文论学者可以从中国古代的生态文化遗产和生态伦理中获得精神养料,而这对推动生态批评的中国化演进很有意义。王宁提出的“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⑤和王岳川的“对文艺自身生存状态研究”^⑥都是借生态学构建中国文论的大胆尝试。

五、新世纪中西文论构建思考

通过梳理“后理论时代”中西方文论构建的不同模式,以及总结新世纪15年间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各个领域与西方文论的交流过程中有效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具体路径,上文探索了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和具体方法,并为我国文论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跻身于国际文艺理论话语前沿领域提供智力支持。

第一,中西方文论构建面临的共同问题。新世纪中西理论学界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首先,“理论已死”拷问着文艺理论研究,甚至人文科学研究的合理性。理论涉及研究的途径、方法、范式、原则和目的,是服务于并指导文艺作品研究的。如果没有“理论”,那么我们应该依托什么研究文艺作品?理论研究的合理性支持着人文学科研究的科学性,那么如果理论难以复兴,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景又在何方?其次,文艺理论的构建的出路究竟在何方?文艺理论构建究竟应该继续突破限制,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的一部分、继续模糊与其他研究领域的界限,

① 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② 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曹顺庆:《中国文论话语及中西文论对话》,《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③ 龙协涛:《文学阅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④ 张锡坤、路静:《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原创性体系建设的初步构想》,《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⑤ 陈众议:《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⑥ 《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第361页。

还是应该回到文艺作品本身，着眼于定义清晰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

第二，“中西对话”是新世纪的主流。不同文明的对立和互补性是中西方文论对话的动力。文明的演进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涵濡过程，文论的演进也是一个涵濡过程。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借鉴难免在冲突中进行。新世纪中西文论交流，既需要继续展开批判性解构或反思性质询，又需要平等、积极、有建设性的学术对话。只有这样我国文艺理论研究才能在解构的同时又完成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艺理论组成了构建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有机整体。三者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否定任何一方的积极作用，都将有失偏颇。

第三，新世纪中西文论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新世纪的中西文论关系已经不是以往那种单向度的从西方到中国的传播模式，而是正在经历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发展过程。历史契机和种种有利因素可能促使中国在 21 世纪迈

入世界文艺理论界的中心位置。中西文论研究各领域都有其优长和不足，在新世纪文论学者应该辨析文论构建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和人文因素，探寻优势资源，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具体方法。

由此可见，研究文艺理论体系构建应以“中西对话”为问题导向，以史论结合、点面结合以及纵横结合的方式关注新世纪中西文论的交流。这也就是说既关注宏观体系的语境，又给出个案解读；既以时间为线梳理历史，也选取标志性事件深入讨论；既关注精英文化，也书写大众言论。新世纪的中西文论研究将是一个涵盖历史研究、社会研究、文化研究、跨文化研究、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多角度、多维度的综合性论题。

本文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讲师

责任编辑：左杨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Xue Yuan

Abstract: Terry Eagleton's seminal work *After Theory* has been considered a milestone pub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raising scholars' sense of crisis and passion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theories. On this basis, this article sets out to investigate the extent of acceptance of renowned statements such as "the death of theories" as inscribed in postmodernism works in China and western academia. It then attempts to chart the development map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with a view to sketching out the major development periods and routes of these theories. This article view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s a new era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s theories in China, and focuses on three major aspec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jor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s theories, such a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and Marxism Literary Theory,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simply criticizing, interpreting, refusing and integrating western theories to constructing theories of Chinese features.

Keywords: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es; post post-modernism; Marxism theorie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ies